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

大运河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连冬花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中国大运河是一条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大动脉,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以中国大运河为载体的大运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资源,也是新时代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资源。大运河文化主要蕴含着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和合凝一、爱国主义的中国文化基因。其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路径有:保护传承利用好中国大运河,凝聚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宿感;诠释运河故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性转化与发展大运河文化,提升其时代价值;规划建设好大运河文化带,展现大运河文化的现实力量。

[关键词] 大运河文化; 涵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路径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8)06-0113-05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通州考察大运河时做出指示:“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1]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形成并积淀了丰富璀璨的文化资源,为什么大运河文化能够成为核心文化资源呢?大运河是一条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大动脉,以两千多年的历史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性格,以大运河为载体而形成的大运河文化,包含着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2]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等。关于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很多,但关于挖掘大运河文化资源,发挥大运河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目前的研究显得非常有限。文章立足于大运河文化具有的文化基因及其体现的中国精神,探讨大运河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一、大运河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资源

大运河文化是基于世界伟大的水利工程——

中国大运河(主要指京杭大运河)而形成的江河文化,既包括凝聚了大运河开凿、贯通、疏浚等各种技术文化、管理文化,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创新的漕运管理和漕运文化,同时还包括汇聚了中华内外的风土习俗、思维审美等的多元文化。大运河文化能否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于大运河文化的精神是否与当代中国精神相一致,或者是否蕴含着当代中国精神的文化基因,且这些精神或文化基因对时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已经证明,河流与文明关系紧密。中国的河流基本是东西走向,唯有大运河是南北走向。通过人工开挖的大运河不仅是古代文明的象征,而且还孕育、创造了灿烂的运河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大动脉,由大运河造就的大运河文化记载并积淀了中国社会运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3]如果从大运河的历史脉络看,中国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成形于隋朝,定型于元朝,终止于清朝末年。大运河沟通了钱塘江、太湖、长江、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成为连接中国南北的水上交通动脉,同时也是与国外交流的水上通道。正是因为这条贯通中国南北,连接中华内外的水上通道,使中国社会既实现了内部循环,又实现了对外交流。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的经济、政

[收稿日期] 2018-07-27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大运河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发展的路径研究”(2018SJA082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JDZD04)

[作者简介] 连冬花(1969—)女,山西清徐人,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专长:科技哲学,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基本围绕着大运河展开,并辐射、带动了社会的其它各个领域,大运河自然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核心载体,以大运河为载体的大运河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宣言书”,^[4]有资格有实力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文化资源。

大运河文化中的中国精神,来自中国人民对大运河的开凿、疏浚与贯通中。大运河首先是一项水利工程,是我国人民认识水、利用水的伟大杰作。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开始使用于农业生产,水利灌溉业也有了发展,这就为运河开凿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但当时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主要还是靠手工劳作。中国古人就是借助着简单的器具,凭借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开始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运河开凿工程。从此,大运河由短到长,由局部到整体,一段一段被开凿。隋朝统一中国后,贯通南北大运河势在必行。为了开凿疏通大运河,隋炀帝动用了全国百万余的劳动人民。《资治通鉴》卷180《隋纪四》记载:大业元年(605)三月“辛亥,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万余,开通济渠。……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5]至此,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正式贯通。大运河,既凝聚着上千万劳动人民群众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也积淀着劳动群体中个体的创造精神。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北方在经济上更加依赖江淮地区,但八年战乱已使大运河航道堵塞、泥沙沉积、岸石崩坏,难以漕运,且战乱使人丁稀少,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居无尺椽,人无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现象,依靠大量人力疏通清理运河已难实行。面对两难困境,时任通州刺史刘晏在接到疏通运河、保证漕运畅通的命令后,通过对运河沿线的实地考察,认真总结前人治理漕运的经验教训,采用了诸如分段疏浚、分段运输、不同河段采用不同结构的漕船等方法,使安史之乱后的大运河再次出现了生机,对唐朝继续统治起到重要作用。刘晏提出的一套漕运方法和组织管理措施,之后被制度化,一直延用了五十年之久。

大运河文化蕴含的伟大智慧,来自于中国人民在大运河开凿利用过程中对困难的解决。作为人类改造自然水流的运河,需要解决一系列诸如测量、选线、规划、施工等技术问题,这些技术在我国现存最早的水利技术理论著作《管子·度地》都有记载,该篇对劳动人民创造的许多宝贵的治水经验进行了总结,为大运河的开凿和利用提供了经验。

大运河的开凿,在规划上主要考虑多利用天然河道,少进行人工挖掘,优点是快速有效,缺点是这类运河一旦放弃经营,很快就被淤废。后来,大运河不断被延长,漕运成为主要目的后,由于跨越了十几个纬度,且地形地势差异较大,如何保证大运河通畅就成为各个朝代关注的问题。到了宋朝,我国人民就在淮扬和江南运河上创造了综合性效益工程的设施——复闸,可以根据潮水涨落,对闸门进行开合,“形成引潮、蓄水、节水和输水的多重功能,以及航道上类似现代化船闸工作原理的工程设施。”^[6]¹¹意大利米兰到17世纪才创造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船闸技术。明成祖时要重开会通河(山东临清到枣庄),会通河需要穿越运河地势最高一段(山东地垒)。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运河民夫白英根据地形、水情等具体特点,将分水枢纽由济宁北移至南旺,以汶水全部水源,筑堤引水,注入运河地势最高的南旺,然后向南北分流,中间建闸38座,“成功实现了多条河流的水源调配和水道水深的控制,”解决了越岭运河段济宁以北水源不足问题,该成就“代表了在没有石化动力的水运时代,中国大运河卓越的技术成就。”^[6]⁷²⁻⁷³大运河取得的各项技术成就,包括有“世界上最早的水库和完善的坝工建筑、运河穿越分水岭和大江大河的水工——水运设施,通过大运河沿线的水源工程,河道上的闸、坝,沿岸的漕仓等,有效地支撑了世界上最长距离的连续水运,反映出17世纪以前中国卓越的水利科学技术及水运管理水平。”^[6]¹⁻²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基于经验而非科学理论,是中国智慧在大运河上的典型表现。

大运河文化的价值是由大运河的功能价值造就的。大运河作为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其主要功能是水运或航运,但其价值远远超越于一般的水上运输。首先,从其水运功能看,大运河以经济省力的方式沟通了中国南北方的交流,促进了南北方经济的发展;其次,从航运线路看,中国地域广阔,境内河流基本东西走向,且边疆有高山、沙漠、大海阻隔,造成中国南北和中华内外交流都比较困难,南北走向的大运河实质上充当了中华大地上的主干道功能,既沟通了中国南北,又连通了“一带一路”。“大运河的本质就是中华民族的动脉,是古代中国道路的主干所在,它所呈现出来‘道’的意义要甚于其‘河’本身的价值”^[7];再次,从其社会功能看,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既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自我内部循环、增强了社会活力,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文化的繁荣、民族的融合以及城市的兴

盛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运河是一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南北动脉、皇朝粮道。针对大运河的特殊价值,有学者甚至这样评说,“没有大运河保证漕运,北京就不可能成为元、明、清三朝的首都,没有大运河,元、明、清的统一就无法维持和巩固。”^[8]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证,大运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象征。

大运河文化蕴含的中国精神,不仅能够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精神的、物质的支撑,而且在中国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大运河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不断被挖掘、诠释和传播,其中蕴涵的中国精神不断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场合被呈现,大运河文化已经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文化资源。

二、大运河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基因

大运河不仅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更是一条承载着中华文化基因的大动脉,它历经两千多年积淀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世界上任何一条运河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仅蕴涵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而且还包含着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运河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和现实支撑,更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那么,大运河主要蕴涵着哪些中国精神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因呢?

第一,自强不息。中国文化的基因,可以追溯到中国哲学的根源——《易经》,《易经》以卦的形式解释说明了中国文化基因。孔子及其弟子们对《易经》首卦《乾》卦做的《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意是说天体以劲健刚强的方式运行,君子要像天体的运行一样自强不息。这种特征具体到人的品格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人的品格是基于这种精神建立起来的。在中国大地驰骋流淌了2500多年的大运河,是中国人民在古代社会借助简单的工具一点一点开挖的结果,是一代又一代的劳动人民以刚健的精神努力奋斗的成果。由于大运河是人工开挖和利用自然水道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与大运河通航相伴的是与水灾水患、泥沙淤积等进行的各种斗争,即便如此,大运河依旧贯穿了中国2500多年的历史,并且至今还在流淌着。“生生不息,恰恰是大运河文化的根本精神”。^[7]

第二,革故鼎新。《易经》的根本精神在“变通”。《革》卦就是“变通”的典型,但革旧而必须纳

新,这就是《鼎》卦之意。“《革》去故也,《鼎》取新也”^{[9]437},即变革创新之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对革故鼎新文化基因的另一种表达。中国大运河全程2700多公里,跨越了十几个纬度,不仅南北降雨量差异大,而且地势和水资源条件千差万别,即便是同一水系之间,也会因分水岭造成地势上的高低差异,特别是河南、山东和苏北地区的运河河道常常会受到黄河泥沙的冲击。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宋代时,我国人民在实践中创造了堰坝设施,实现引潮、蓄水、节水和输水等的多重功能,这套复闸工程系统成为当时领先世界的标志性工程。此外,大运河漕运管理同样是历朝历代都特别重视的大问题,以致康有为评论说:“漕运之制,为中国大制”(康有为政论集)。的确,每个朝代,都要依据具体的情况创造出适合自身国情、民情的漕运管理体系。即便是同一朝代,由于社会的变化,漕运管理制度同样要创新发展。如在唐代,由于安史之乱带来的不良后果,之前的漕运管理制度已经不再适用社会的变化,通州刺史刘晏对漕运进行改革,创造了漕运转搬法,才改变了安史之乱之后漕运的衰落现象。可以说,开拓创新精神一直贯穿于大运河流淌的二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

《革》卦象征着变革,变革必经历磨砺,但《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9]434}改变旧命运,就会迎来美好新生活。大运河的贯通,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中国南北、改变中国古代社会命运的人工河,以致有学者把大运河看做是“中华民族的大运之河”。^[4]中国人民历经从春秋时期的开凿到隋唐时期贯通的磨难后,大运河为古代中国带来了新生活。首先,在保证运河航运的前提下,运河两岸人民把大运河与农田水利建设联系在一起,使沿线农业逐渐发展起来,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其次,借助各种南北通航带来的商机,积极发展工商业,极大促进了运河区域工商业的发展,并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兴起,使运河区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中心区域。这都是运河沿线人民砥砺奋进、追求美好生活的收获,是大运河精神培育出的不惧风浪艰险的成果。改革开放后,被大运河穿城而过的无锡,继承发扬了大运河文化中蕴含的变革精神,首先开创了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无锡模式,苏南民营经济蓬勃而起,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此后形成的浙江模式,同样是在艰苦的创业过程催生的,坚韧不拔、敢抓机遇,勇于变革的运河文化基因正是浙江精神形成的文化基因。

第三,和合凝一。《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乾》之德在自强不息,《坤》之德在厚德载物。广大无垠的大地包含宽厚的美德,以宽广的胸怀包容、承载着万物。《坤》之厚德载物造就了中国人即便是“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10]这就是中国文化精神中的和合凝一。大运河流经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吴越文化、淮扬文化、徐汉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京畿文化犹如一颗颗明珠串联在大运河沿线。由于大运河的流动性,这些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文化随着大运河的流动而相互接触、交流、融合,形成了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既具有中国文化的一般特性,又包含明显的地域特色,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大运河文化的“和”与“合”还表现为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中国大运河北挽陆上丝绸之路,南接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内地与海外世界各地联系起来。唐朝时期,国门四开,外国使节、商人不断来到中国,大都经运河来到长安。不仅隔海相望的日本、新罗,就是远隔重洋的阿拉伯、波斯、天竺等国都与我国频繁交往,当时的长安因大运河成为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大运河文化吸收借鉴了诸多外来文化,但由于大运河南北贯通的流动性特点,使运河区域的人们具有相近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在文化上表现为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大运河带来的诸多外来文化,经过转化后成为大运河文化的元素。

第四,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反映的是个体对所在国家依存关系的情感诉求。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于核心地位。我国《女娲补天》和《后羿射日》的故事就表达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爱国主义的情怀。作为航运的中国大运河不仅具有军事、经济等功能,而且具有政治功能,即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功能。隋唐及其之后的各个朝代,都是凭借着大运河理想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做到总揽大局,统治全国的。特别是元朝统一全国后,中国没有出现大的分裂。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大运河本身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其中承载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红色文化基因。大运河上的嘉兴南湖,是中国共产党传播革命火种的发源地,大运河上的微山湖,抗战时期,被称为“湖上小延安”,留下脍炙人口的《铁道游击队》主题歌,不仅激励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无数青年,同样激励了建设年代的无数青年。大运河边冀中平原上的游击队,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通过游击战、地道战等形式

进行抗日活动,在我党历史上同样写下了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从南到北,运河沿线爱国主义的文化基因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力量。

大运河文化蕴含的文化基因,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根基土壤,“活起来”的大运河文化能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起到积极作用。

三、利用大运河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1]我们要“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本固基的基础工程,作为一项根本任务,切实抓紧抓好。”^[1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又需要优秀传统文化对其涵养壮大。

大运河文化蕴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基因,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又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优秀资源。如何结合时代需要,发挥大运河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就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具体来说,大体有如下路径可循:

第一,保护传承利用好中国大运河,凝聚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宿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大运河是汇集中华民族凝聚力、培养爱国主义的重要载体,一定“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国大运河沿线生活着3亿多居民,大运河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情况如何,直接和他们的生活生产休戚相关。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沿线人民群众就会有深深的获得感、自豪感,就会增强人民群众对大运河历史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热爱大运河,保护大运河也就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民群众对大运河的热爱,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热爱。如果把大运河历史文化价值转化到新时代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甚至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和实践就会在大运河沿线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

第二,诠释运河故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大运河是至今还在奔腾流淌的活态遗产,2500多年的历史已经使沿线百姓把大运河和自己的生活生产融为一体,以致忘记了思考大运河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中国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沿线城市都对大运河进行了开发,但对于相当一部分市民来说,中国大运河只是一个词而已,他们本身对大运河了解不多,有些人也没有太多兴趣去了解。熟知等于真知的假象使大运河蕴含的各种功能和价值无法展现出来。究其原因,是没有发挥大运河遗产被诠释的功能。遗产具有教育社会功能,当其做为社会教育资源和历史的物证时,具有生动直观的优势。因此,要发挥运河文化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就要针对受众群体诠释运河故事,通过运河故事使沿线人民从历史层面了解大运河的伟大,从文化层面认识大运河的时代价值。为此,可以通过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形式讲好大运河故事,传播大运河特色文化和时代价值,使运河文化资源不仅在运河沿线,而且在全国甚至全球得以传播共享;此外,借助旅游参观、博物馆展览等方式展现大运河的卓越成就,传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抓手。

第三,创造性转化与发展大运河文化,提升其时代价值。中国大运河承载着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基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根基所在。利用大运河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需要传承大运河文化中的文化基因,又需要与新时代相结合,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此,需要结合运河沿线各省市的实际情况,本着贴近群众实际的原则进行转化和发展,让人民群众深刻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的绵延。所以,运河沿线城市要大力挖掘并充分利用好各自的运河文化特色,并通过生动直观的形式展现运河文化蕴含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价值观、红色革命文化价值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人民群众之心脑,进而内化到日常生产生活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第四,规划建设好大运河文化带,展示大运河文化的现实力量。“大运河文化带以大运河文化为内核、以保护、传承、利用为主线,以带状地理空间为载体,以区域交通束为基础,以沿线城镇为发

展主体,集遗产与生态保护、经济与社会发展、文化与休闲游憩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功能区域。”^[13]大运河文化带的规划与建设,本质是在保护传承中国大运河遗产的前提下,解决沿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解决沿线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也是满足运河沿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保证沿线城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举措。大运河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可以通过大运河文化带这一彰显文化自信的地标性工程,“将古代运河文化的精华融入现代的运河带,转换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文化,”^[8]展示大运河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力量。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抓好城市规划建设 筹办好冬奥会[EB/OL]. (2017-02-24)[2018-03-2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2/24/c_129495572.htm.
-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2.
- [3] 吴欣.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N].光明日报,2018-02-05.
- [4] 樊和平.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的大运之河[EB/OL]. (2018-06-12)[2018-06-25]. <http://xh.xhby.net/mp3/pc/c/201806/12/c491956.html>.
- [5] 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上册[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292.
- [6] 谭徐明,王英华等.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及价值评估[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
- [7] 谢光前.论运河文化与中国道路[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
- [8] 葛剑雄.大运河历史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刍议[J].江苏社会科学,2018(2).
- [9] 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0]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05.
- [11]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
- [12]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24.
- [13] 熊海峰.大运河文化带的内涵解析与建设对策研究[J].人文天下,2017(12).

(责任编辑:闫卫平)

(下转第124页)